

中共还有救吗？

—— 中共在弃船前是否还有一条生路

高 寒

本文音频版

最近，政变之声不断，换人小道疯传；个人迷信戛然而止，影射文字频见报端；还有头版呈晴雨表，直播现黑衣人，拥戴少跟进者，……等等、等等，一时间，众说纷纭，目不暇给，给虚骄踌躇的中国政坛带来一股波谲云诡的气氛，给暮气沉沉的中国共产党带去一片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醒世景观。

（一）是换人，还是换制度？

近日，“换人，换人！”从窃窃私语，到公开发声，似乎这“换人”说，越来越成为突破危机的共识了。但我却颇不以为然。从中共打得天下、坐进中南海算起，中国共产党不是换了好几代了吗？过去说是大老粗整知识菁英，中国自由派今天嘴上一口一个“土共”即导源于此。然自江泽民、朱镕基始，可是工程师治国，专家教授海归治国呀，可这个国，又治得怎样？

遥看习近平“登基”当年，倡导轻车简从，并率先垂范，视察深圳不封路、不清场。可近年来，习所到之处，岂止封路清场？商家歇业、快递停运、居民断炊、市民出游，均时有听闻，似成新常态。在香港，保镖的人肉墙，筑到机场的客梯旁，并还随防弹车启动一起奔跑，跟隔壁金三胖有一拼。今天，拿习新政伊始公布的《八项规定》来对照，仅看其中的第六条：“对中央领导人的新闻报道要压缩报道数量、字数、时长”；第七条：“个人不公开出版著作、讲话单行本”，即可知他本人违反了多少。

诚然，这种中共领导人自食其言的事，并非自习近平始。较著名的，近有温家宝的“仰望星空”、朱镕基的“一百口棺材”和江泽民的退而不休；远则有邓小平的终身制废而不除，和毛泽东的“窑中对”誓言。

如此看来，不讲诚信，没有诚信，甚至“不说谎话就办不成大事”，还真成中国共产党的某种传统了？如此看来，将“诚信”作为刷遍全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诚实”作为从娃娃抓起的《小学生德育守则》，岂不太讽刺了？这就难怪中国如今成全球造假之最，成毒疫苗、毒奶粉、毒食品的王国了。

对中国共产党一代又一代领导人政治诚信的缺失，中国自由派多从道德上探源，中国毛左派则倾向于选择性批评。而我，一个反思的毛派、民间马克思主义者，却宁可从治理体制自身的轨迹上去寻根。

如果不因人废言，我倒同意邓小平当年倡导政治体制改革时的一个说法：“制度不好，

好人也会变坏。”

那么，何谓坏制度呢？尽管各种意识形态众说纷纭，但我想，一个逼迫最高领导人不讲诚信的制度，一个不食言执政者就无以立足的制度，一个层层说谎以致峰层根本就听不到真相的制度（想一想毛当年派秘书、警卫员下乡去调查饥荒灾情吧；想一想才不久传说中的习是从他女儿处才获悉泼墨事件的吧），一个上上下下都奖励谎言惩罚真话的制度，这在古今中外总该算一个坏制度了吧。

就习近平来说，我倒还真不认为他当初的“轻车简从，不扰民”的宣示不是发自其内心。但是，几年铁腕反腐下来，党内树敌过多，不层层铠甲护卫，恐怕他自己连身家性命都难保了。可见，在某种意义上，此“食言”实属不得已而为之：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其实，当年毛泽东对联合政府的“食言”，又何尝不是如此？如若按章乃器、储安平们的意见行事，长此以往，可以预见，中国资产阶级将发展壮大，共产党或将政权难保了。诚然，轮流坐庄，联合政府得以保全，但从来就以造反农民“打江山坐江山”的心态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它会心甘情愿吗？更何况，当初毛泽东在发明“新民主主义”这个全新操作系统时，压根儿未曾设计过发明者的退场程序。于是，系统中的这个 bug，便致使毛泽东当年对联合政府的食言与失信，似乎也属“不得已而为之”了：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然而，毛泽东当年惊天动地的失信保住了共产党政权吗？回顾大半个世纪的执政史，可以这么说：政权是保住了，但共产党却给保没了。乍一看来，共产党还在台上，明年就要大庆建国七十周年了。可是，定睛一看，除了衣着，这个政权与当年洪秀全、李自成的那个政权又有何异？中国共产党今天执掌着的这个政权，还是当年方志敏、夏明翰、江竹筠们前仆后继、拳拳“初心”中的那个政权吗？还是当年《新华日报》几百篇社论所鼓吹、所憧憬的那个政权吗？它上上下下今天还有着一丝一毫工农当家作主，为人民服务的气味吗？

同理，习近平今天立竿见影的失信就真给他自己带来安全吗？比较一下人家德国总理默克尔大妈可以拎个篮子逛超市，比较一下人家荷兰总理下班后可以骑着自行车逛大街，你习大大作为一个泱泱大国领袖的人身安全指数，可被人家比得甩出好几条大街了。管中窥豹，你还“制度自信”个啥？

换一个角度来看，导致习近平不得不超强安保到离谱的那些个他之视为安全隐患的“贪官”们，其犯事不也多是“不得已而为之”吗？在一个老百姓对官员的施政毫无发言权的制度里，在一个官帽全靠上司派发的体制下，在一个市场机制只是权力傲慢的应召女郎的社会中，官员们要做到既守清廉又要为官，难道不也是“非不为也，实不能也”吗？

由此可见，无论是从国家领导人均无一不靠食言与失信治国，还是从官场中无人有安全感来看，正是这个制度自身的运作机制和运作惯性，正是这个制度以它“不得已而为之”这只看不见的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代复一代，一步一步地逼人说谎、逼人变坏、逼人作恶，逼良为娼，……。试问，这样的一种政治制度，是好还是坏呢？如此制度，近七十年来，其积重难返，其病入膏肓，已可想而知了。既如此，今天仅仅靠换个人还有救吗？仅仅靠譬如“谣言”中说的换上汪洋替代习近平，还有用吗？如此制度，换上任何一个好人上来，欲站住脚跟，他能不变坏吗？！

(二) 中共正面临“六四”后第一次严重政治危机

自“六四”枪声一响，中国共产党就完全停止了政治体制改革。自习近平喊出“竟无一人是男儿”，政治体制改革的口号也随之销声匿迹了。

自那以后，官权肆无忌惮地扩张，民权惊心动魄地压缩。在江泽民“闷声发大财”的腐败治国路线下，中国共产党上上下下均狂奔在纸醉金迷的“钱途”上。自此，中国共产党终于大体完成了它从一个被剥削阶级向着剥削阶级的转变，从一个被压迫阶级向着压迫阶级的转变。如今的中国共产党，从基层村官到中央峰层，均已堕落为一个与全体人民尖锐对立的特权利益集团，一个每日每时都在吸吮着全中国人民膏血的剥削阶级和压迫阶级。中国的工农兵学商各阶层人民今日与中共特权阶级的维权斗争，是不折不扣的阶级斗争，是波浪壮阔的阶级斗争。没有这种全民觉醒、全民抗暴的阶级斗争，这个官僚特权阶级不会感到末日的到来，不会发生内部的分化，也不会考虑制度的改变。

事实表明，还在八九年学潮高峰、军队尚未进城之际，邓小平就已作出了最坏的打算：不得已让共产党流亡。记得刘宾雁先生就曾数次在我面前提起过：当年学生占领天安门闹得正欢时，中共高层就曾派员专程从日本赴美拜访过他，商请他出面在海外拉出一个中国共产党特别委员会。宾雁对我说：“后来开枪了，他们就再没来找过我了！”须知，当时刘宾雁并非中共党员，他的党籍早在两年前就被邓小平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给开除了。宾雁后一直被禁回国，80岁客死他乡。中共急时求人、过河拆桥，由此又见一斑。

或许，宾雁先生所提及的八九年旧事，就是中共“沉船计划”的雏形和缘起吧。苏东事变后，中共心有余悸地吸取了八九年险些翻船的教训，其“沉船计划”便由紧急应变转为战略部署了。而海航，这个集沉船计划与盗国阴谋于一体，党产与私产交融的阴阳胎，便在江泽民腐败治国路线之下应运而生了。如果再联系到郭文贵爆出的姚依林家族早在八九年即在美国置产，联系到姚当时的中央财经掌门人背景，很可能，这就是那时中共党产应急转移撤退计划的一部分吧。很可能，为因应当时的天安门危机，中共高层几大家族，均参与了这个应急转移撤退计划。这或许便开启了其后国资外流+裸官潮之滥觞。

在留好退路、将西方各国当作资产和人员安全撤退的“大后方”之后，中共特权阶级在国内盘剥人民、勒索商家、钳制舆论、镇压异议，也就更放得开手脚，更得心应手了。然而这一切，却在2017年亮起了红灯，出现了危机，而且是断其后路的危机。这就是横空出世的郭文贵爆料革命。

郭文贵的爆料革命，同时在传统民运几十年来均够不着的两个领域展开。一是中心爆破：揭示出当下选择性反腐的主将居然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大贪官大裸官，由此对体制内人心的震撼几乎是颠覆性的。二是从西方利益入手——传统民运只知从价值观呼吁或抱怨入手——调动起西方的法律资源，来让中共盗国贼们转移出的窃国有资产陷入恐慌。由此而形成的对中共特权阶级的合围杀着将军棋局，便自然是那帮早已被视为疥癣之疾的海外民运衮衮诸公所难以望其项背的了。

郭文贵的爆料，是四十年来处于中共官权压榨下，一直战战兢兢、笑脸逢迎、逆来顺受、饱受摧残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公开发声；郭文贵的发声，其所代表的——犹如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新兴资产阶级一样——是远比他身处的那个阶级要宽泛得多的阶级利益。所以，今天郭文

贵是在为着整个被压迫被剥削的“第三等级”而战。他代表着杨改兰，代表着孙志刚，代表着杨佳，代表着邓玉娇，代表着雷洋，代表着袁宝璟，代表着高智盛和郭飞雄，……。更何况，这一场发生在中国内部的具革命性质的改良或具改良性质的革命，与由特朗普领军的重定义西方与中国（政权）关系的国际大洗牌，似乎刚好在 2017 年巧遇了。这种历史偶然性背后的历史必然性，其摧枯拉朽的巨大能量及其伟大意义，如今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执掌的政权，迄今还深陷在“农民造反-皇权复辟”这个已轮回了数千年的历史怪圈中，苦苦挣扎，左冲右突，找不到出路。从目前中共当局内外交困的一片乱局来看，这是“八九六四”之后，它第一次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政治危机。这是过时的特权文明与新兴的权利文明的一次迎头相撞，是前现代的价值观与当代价值观的一次文明对决。面对中共这种前现代政权早晚要遭遇到的这种危局，你仅靠换个人上台就能应付过去吗？如今，西方世界还是你们沉船后的大后方吗？在这个信息化地球村时代，小小寰球，何处为你们弃船后的安身立命之地呢？

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所以，中国共产党内的有识之士们，中共红二代的太子党们，为你们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计，此时此刻难道不是已到了你们该静下心来想想“沉船之前还能中共寻到一条生路来”的时候了么？！

（三）中共还有救吗？

如今，似乎已成千夫所指的中共政权还有救吗？尽管眼下海外“推翻、清算”的喊杀声一片，可是我则要说一声：或有华山一条路，一条中国共产党如今可自救的唯一生路：

在意识形态上正本清源，回到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承认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阶段之不可省略和不可跨越；承认社会主义文明必须以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文明为前提。从而承认属当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普世价值，在以反专制皇权复辟为首要任务的今日中国之必须。彻底摒弃斯大林主义（学名：“马列主义”）；在政治上以开放共产党内派别合法化来启动中国的多元化文明进程；给“篡党夺权”平反，执政党最高权力靠党内公开竞争上岗，受下岗者监督；由此来示范和牵引由中国共产党所主导的中国宪政民主的有序转型。在经济上实行混合所有制市场经济，保护私有产权，改革开放利益惠及全民。在国际上，则以一个共产党所主导的转型期之宪政民主和市场经济大国身份，理直气壮地参与同美国、欧盟的全球竞争。如此，内可逐步化解历史积怨，更新和升级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有定力地去面对来自右或左的挑战；外则能以一个稳定、发展、富强之世界后发的新型宪政民主大国的姿态，负责任地参与全球规则的制订。

这便是今天我为中国共产党给出的“换人不如换制度，换制度亦无须改旗易帜”之路。无疑，它是一条有风险但也存有机会的路，一条维持既有法统也除旧布新从而免遭清算的路，一条可使中国共产党凤凰涅槃，逐步卸下历史包袱而轻装面向未来的路。

或问：哈，你这不就是鼓吹“党主立宪”吗？人家冯胜平早就提出过多年了。

否！粗心的人往往察觉不到事物间的差异，尤其是在“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处。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冯胜平先生，前些年在他陆续写给习近平的三封洋洋洒洒的万

言长信中，借鉴君主立宪制而提出来的“党主立宪”，尽管其设身处地、苦口婆心，竭尽进退得失的功利考量，但却仍可一言以蔽之：要中国共产党改信自由主义。这就犹如要无神论者信神，基督教徒改信伊斯兰教、佛教；或者反过来，要有神论者信无神论，要伊斯兰、佛教徒去改信基督教一般，其强人所难，莫此为甚。因此，它字里行间浸透着的意识形态优越与傲慢，与其文字上的放低身段和情真意切恰成反比。

而本人三十年来一以贯之地提出并坚持的“回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特定时空下的马克思主义者干资本主义，实乃科学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则是从本来面目的马克思主义出发的，也是从曾指引中共夺得天下的那段新民主主义的自家党史传统出发的。我的这套主张，不是要打倒共产党，而是要提升共产党；不是要放弃马克思主义，而是要坚守马克思主义，不是要熄灭共产党人胸中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而是要让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旗帜，在遵从历史必然性的脚踏实地实践中，在摒弃乌托邦共产主义给人类带来巨大浩劫的反思中，重新高高飘扬。

为此，就必须彻底反思从“十月革命”以降的整个东方革命史，必须彻底反思苏共和中共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执政史。并在这种痛彻心扉、刮骨疗毒般的反思中，彻底抛弃那个导致专制皇权特权文明在“社会主义”名号下之堂而皇之大复辟的斯大林主义，即苏版“马列主义”。这在中国，就是要彻底抛弃被王沪宁这位“三朝帝师”、“意识形态化妆师”所忽悠了三十年、且让中共道路越走越窄的那些个不断变换新提法之不伦不类的所谓“新时代理论”。^{（注1）}

或问：既然中共已陷内外交困，那为何不就干脆发动革命一举推翻它，你反而还要去“救”它呢？

答：古今中外任何革命的发生，都离不开革命危机的形成。其典型的标志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不能照常地生活下去了。然而，革命危机却并非如同加工产品那般可人为地给制造出来。革命并不是价值观的宣泄和诗情的浪漫，革命必须计算进退得失，革命必须得讲输赢。故革命就必须冷静地考察主客观的条件，考察彼我双方的综合实力对比，……，如此等等。

因此，从客观上看，眼下尚无国际战争危机可有效地削弱本国的统治机器；从主观上看，中国的政治反对派——无论改良派还是革命派，无论自由派还是毛左派——均还只知“政治正确”，而不懂“多元共存”。尤其是，尽管如今中共统治者已不能照常地运转下去了其迹象越来越明显，但被统治者却还远未沦落到也不能照常地生活下去的那种地步。所以，目前中国爆发革命风潮的主客观条件还有待进一步的成熟，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国政治的僵局却只会使中国宪政民主革命的压力越来越大。正是这种客观上的引而不发的革命压力，为统治集团内部留下了改良变革的历史空间和时间。所以，这里的“救”，不过是在当下此时此刻，为一直苦于在历史周期律怪圈中找不到突破口的中国共产党，为在郭文贵爆料革命压力下的中国宪政转型困局，给出一条可打破僵局的出路而已。诚可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是也。

注1： 本人的这些想法，散见于我三十多年来陆续写下的近百万字的诸多文章（拟以《东方马克思主义重述》出版的自选集）中，也凝结于我今年4月应征投给北大主办的“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却遭拒绝的《历史唯物论与东方革命——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一文中。此文可见[高寒九派博客](#)。）

如果说任何革命都是由统治者的压迫给硬逼出来的，那么任何改良也是由“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被统治者的持续抗争给硬逼出来的。所以，不是什么“告别革命”出改良，什么“和理非”^{（注2）}拜物教出改良，而恰是实实在在的革命逼出改良。其实，革命与改良，二者都不过是给历史的必然性进程廓清道路，清除障碍而已。其区别仅在于手段上的非法与合法，以及不同时空下的不同有效性罢了。正是基于此，故我从来都反对在革命与改良上的盲目性和幼稚病，并一直主张：革命与改良均为中国民主宪政转型总战略的组成部分。^{（注3）}

故在我看来，眼下正方兴未艾的郭文贵爆料革命，其锋芒所向，正是全方位的内外强力施压，以敦促中共开启体制内的宪政民主变革而已。

至于中国反对派的不成熟，这只须看看今日中国的自由派和毛左派，以至自由派营垒中的改良派与革命派，或刘晓波派与高智盛派，还有那边厢的毛左派中的这派和那派，……，其中哪一派又不是把对方恨得牙痒痒，必欲有朝一日彻底除之而后快呢？哪一派又具备了可与对方共处于一个体制内去干竞争政治的预期呢？其实，中国民间反对派如今所共同声讨的中国共产党，它从夺权的成功走向掌权的失败，从昨天军民鱼水情的真老虎，变成今天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纸老虎，究其根源，难道不正是在这“多元共存”文明上跌了大跤子吗？由此可见，中国今日无论是左还是右的反对派，与其作为政治对手的中国官派，在文明的认同上，说穿了还都浸淫在一个同质化的一元化文明的大染缸里，不同的只是一个在台上，一个在台下而已。

或问：为何你仅仅主张开放中共党内派别合法化，而不是主张开放党禁？你这算哪门子的宪政体制呀？

答：开放中共党内派别合法化，这当然还算不上是完成形态的宪政民主体制，但它毕竟算是迈出了体制转型的第一步，而迈出这第一步恰恰是最为艰难的。况且这里谈的是当权者所主导的宪政体制转型，而非泛泛地议论一般宪政体制转型，更非在讨论中国自由派们念兹在兹“清算”的那种制度转型。

较之一步到位的开放党禁，这个开放执政党党内派别合法化的门槛就要低得多，相应地，其阻力也会低得多了。在中国今天的国情下，让中共党内派别合法化，毋宁可视之为使中国摒弃其根深蒂固的一元化文明的一个捷径。试想一下吧，当年彭德怀、张闻天、邓子恢等一千务实派，若能在党内合法地制约毛泽东，中国大跃进还会付出饿死上千万农民的惨重代价么？而在邓小平时代，倘若党内有个毛左派在一旁虎视眈眈地盯着，中国共产党还会如今天这般通体腐败得一发不可收拾么？

中国自由派常拿一句英国格言作为口头禅：“两个恶魔胜过一个圣人！”既如此，即使习近平如今已是你们眼中的“恶魔”，那么，倘若中共具备了某种机制，让习近平与你们眼中的另一位“恶魔”——譬如：薄熙来——竞争起来，看看这种机制会不会使他们双双变成“圣人”呢？会不会让中国政局出现某种转机呢？倘能如此又何乐而不为呢？至少，这总比你们成天只知哀叹中国就倒霉在几个恶魔掌权，总比你们成天只热衷于用执政者个人品行去诠释历史这种低级趣味，要更靠谱一点，也更符合上述口头禅吧？

注2：“和平理性非暴力”之缩写。

注3：参见高寒：《革命与改良均为中国民主转型总战略的组成部分——与郭罗基先生商榷》（原载1998年10月号《北京之春》）

如果说，今天的共产党，已经不是当年方志敏、夏明翰、江竹筠们“初心”中的那个共产党了，那么，让习近平和薄熙来，或者，习近平超脱其上，让汪洋和薄熙来竞争起来的那个共产党，还将仍会是今天的这个令全中国人民都不爽的共产党么？试想在竞争机制中的习近平、薄熙来或汪洋，乃至毛泽东或邓小平，他们还有谁能权力任性地把一己之见推向极端，不撞南墙不回头呢？还有谁敢对百姓呼声充耳不闻，我行我素大搞特权特供，拒绝公布官员财产，拒绝停止在国外大撒币，……呢？

站在共产党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党内合法竞争中的派别谁在台上，就都还是共产党在掌权；而站在自由派的角度上看，这至少总比万马齐喑、定于一尊要强，至少总会发现其中的可生存、乃至可施展拳脚的空间吧？既然双方都能从这迈出的转型第一步中看到自己的利益之所在，那么为何就不可以将此视为朝野的第一个共识，视为朝野双赢的一个开端呢？

至于毛左派，即使你们不承认任何与自由派在法制框架下去竞争的制度，但至少你们得承认：让你们在共产党内有发言权，有竞争执政权，让全党来选择，总比现在自己动辄被封口要强一点吧？如果你们拒绝承认“竞争”这资产阶级文明的玩意儿，而只承认“打倒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只承认“剿灭邓小平修正主义集团！”，那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反面就是“己所欲，得施于人”。既如此，面对今天自己被打倒、被剿灭，就还有啥感到不爽的呢？更何况，想一想当年马恩领导的德国社民党内的拉萨尔派和埃森纳赫派；想一想当年马恩盛赞过的巴黎公社的普鲁东派、布朗基派和巴枯宁派，想一想巴黎公社国歌为讴歌资产阶级革命的《马赛曲》，想一想后来苏（俄）共驱逐、镇压党内孟什维克的教训，就该明白何谓本来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多元文明之扬弃的建党原则和建党传统了。

总而言之，尽管郭文贵的爆料革命和特朗普的全球战略，如今已使内外交困的中国共产党还在作困兽斗；尽管墙外的“打倒共产党！”已是喊杀声一片；尽管无论是挺郭派还是砸郭派彼此互怼但却在“倒共”这一点上具有坚硬的共识；尽管我毫不怀疑爆料革命正在促进中共核心层有所反省，有所分化，并定将重新洗牌，但我还是倾向于认为：迄今为止郭文贵的爆料还只是破而非立，至少并非清晰地立。固然，破是立的先导、破是立的前提，故谓“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然而，破毕竟不能自然而然直接就等同于立，故有立才有真破，立新才是破旧的完成。如此，这便在破与立之间，由此及彼之间，此岸与彼岸之间，发生了一个如何转型的问题。如此，便让每一个关心和参与这个转型的人，在革命危机真正到来之前，均面临一个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将转型期的阵痛降到最低的问题。

所以，作为一个自始至终的坚定的挺郭派，作为一个从来都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政治信仰的马克思主义者，今天我还是宁愿将挺郭营垒中的“打倒共产党”理解为：打倒共产党（中的）反动派，即盗国贼。犹如当年毛泽东只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而不喊“打倒国民党！”一样。基于此，特写此文，与挺郭营垒中持其他任何信仰的战友们分享。

同时，也借此寄语中共党内和红二代中的改革派，乃至自由派和毛左派中的务实派们。

完稿于 2018/8/4 纽约
gaohan2005@gmail.com